

两岸互信的社会生成研究

沈惠平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两岸建立互信是两岸关系的核心。由于社会基础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最坚实的基础,因此从社会基础入手是探讨两岸互信问题的关键。社会学中的社会生成原理对信任问题具有独到的分析视角,可为两岸互信问题提供借鉴和启示,例如两岸互信的社会生成意涵、机制与路径等。首先,两岸互信的社会生成是一个具有自我增强效应的持续过程,它需要相关社会条件的创造;其次,两岸互信的生成机制有其内在的规律,与社会规范、社会情绪以及社会网络等因素密切相关;最后,基于上述两岸互信的社会生成意涵和机制,两岸互信的社会生成路径主要包括两岸积极、主动的信任教育,两岸社会制度的相互调适和两岸合作治理等。总之,两岸互信的社会生成既需要相应社会条件的造就,也需要两岸双方的积极作为。

关键词:两岸互信;社会生成;社会条件

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4)01-0008-07

两岸互信顾名思义是两岸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两岸建立互信是两岸关系的核心。但近些年来两岸关系的快速发展也逐渐暴露出两岸之间一些固有分歧,影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各种负面消极因素也不断浮现,这说明两岸之间仍然缺乏足够的信任,由此导致两岸关系迈向纵深发展的进程迟迟难以有所突破。鉴于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由于社会基础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最坚实的基础,因此从社会基础入手是探讨两岸互信问题的关键。本文即针对于此,运用社会学中信任(文化)的社会生成原理来探寻增进、巩固与深化两岸互信的社会基础,也就是两岸互信的社会生成意涵、机制与路径等。

一、两岸互信的社会生成意涵

信任问题一直是西方社会学理论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不同学派运用不同的视角对于信任给予了解读。波兰学者彼得·什托姆普卡(Piotr Sztompka)独具慧眼,他从其倡导的社会生成理论(social becoming)^[1]出发对信任进行系统研究,提出了信任文化的社会生成模型,为我们研究信任问题提供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研究”(12JJD810011);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的民意问题研究”(11AZD034)

作者简介:沈惠平,男,博士,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国家“985工程”台湾研究创新基地成员。

了一种新的社会学视角。什托姆普卡认为,信任文化是一个规则系统,包括规范(norm)和价值(value),它们调节给予信任和达到、回报信任以及相互信任的行为,简言之,它是一个关于信任的可靠性的规则系统。同时,信任文化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其被看成是源自于社会成员的跨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集体的、共享的积极经验的结果。^[2]

基于对信任文化生成的社会环境、社会情绪及集体资本之详细论证,什托姆普卡提出了信任文化的社会生成模型。他认为,“信任的社会生成”从信任文化的某种固有水平——信任或不信任——开始,以此为起点,现实的结构环境——规范的一致性、稳定性、透明度、熟悉性、责任性,或缺乏这些东西——将提高或降低伴随信任的酬赏、积极的经验,以及信任赌博被实现或背叛的可能性。“而那些敞开的或关闭的对于更容易进行信任冒险的结构性机会被抓住还是被忽略,还要依赖于行动者的能力”。作为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典型的信任或怀疑人格特征的聚合性结果出现的社会情绪,可能激励或阻碍信任文化的形成。同时,信任文化出现之后,它就变成了信任的社会生成的下一个循环的背景条件。于是,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之上,信任或不信任文化经过无数次的决定累积之后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它一旦出现就获得了独立的力量,在信任或不信任的方向上推动这些决定,并且在这种意义上补充和改变信任的计算。”^[3]

近些年来,两岸关系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时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成为两岸同胞的主流民意,两岸双方不仅巩固了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互信,而且在经济、社会、文化、人员往来等诸多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尽管如此,由于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未来的两岸关系依然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唯有建立牢固的两岸互信,才能够实现两岸关系的改善与和平发展。进一步说,要实现两岸关系的“可持续和平发展”,说到底就是要不断巩固和深化两岸之间的相互信任。承上所及,“信任文化是根源于历史并且是集体地分享信任的积极经验的结果”,^[4]两岸互信的社会生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首先,两岸互信的社会生成是一个持续的累积过程,具有连续性。从1987年以来的两岸经济交流和民间交往,为两岸互信的社会生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海协会和海基会就是在两岸交流交往中应运而生的,其目的之一也是促进两岸交流和交往。1992年两岸两会为了处理两岸交流交往中的衍生事务,在香港的会谈中达成“九二共识”,并成为两岸协商谈判的基础。2008年马英九上台执政以来,特别是经历过2012年台湾选举之后,“九二共识”已经成为进一步巩固与深化两岸互信的坚实基础。简言之,无论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汪辜会谈”,还是2008年两岸“三通”直航得以实现,以及2008年以来两岸两会的多次商谈,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两岸互信不断向前发展。事实证明两岸互信的社会生成是一个不断化解双方矛盾的持续过程。

其次,两岸互信的社会生成具有自我增强的效应。所谓自我增强效应是指“存在一种良性循环(virtuous loop),从已经存在的信任文化开始,通过所给予的被证实的信任,其结果是增强的信任文化”。与之相反,“存在一种恶性循环(vicious loop),从已经存在的不信任文化开始,通过收回信任,其结果是增强的怀疑文化(culture of suspicion)”。^[5]目前两岸关系已进入和平发展期,但两岸互信仍然存在相当大的脆弱性,2009年热比娅电影播放事件、达赖访台引起的风波,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杨淑君失格”事件、“东京影展”风波等表明两岸互信水平仍然不尽人意,可能导致两岸之间的互疑增强,甚至两岸关系恶化。因而两岸互信需要得到双方的精心呵护,如古人所云“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双方应该多做积极、正面、善意的事,不做消极、负面、恶意的。正因信任文化的形成具有自我强化功能,“两岸应以善意的活动,带动彼此善意的感动”,^[6]引发相互良性的回应,在既有信任

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巩固与深化两岸互信,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则可能前功尽弃。

最后,两岸互信的社会生成需要相关社会条件的创造。为了研究信任文化的社会生成,什托姆普卡曾提出信任文化得以生成的五种社会环境要素即社会规范的一致性、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和社会组织的透明度、人们对于采取行动的环境的熟悉性以及其他人或机构的责任性(accountability),强调这五种宏观社会因素为人们做出信任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形成一种规范性的文化氛围,使得人们提高了信任的可能性。^[7]虽然近些年来两岸互信有所增长,但当前仍处于低层次的初级阶段,较为脆弱且容易波动,具有不稳定、不厚实及不成熟等特点。究其原因,两岸互信水平低既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又有复杂的现实背景,两岸之间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结构性难题,两岸现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两岸民众之间的某些误解等,都是需要通过创造相关社会条件才能够加以解决的。

综上所述,两岸信任文化不可能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通过某个特殊事件的影响而建立起来的,其生成是一个需要共同努力的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深刻认识和遵循两岸关系的发展规律,努力探寻深化两岸信任所遇到阻碍的解决办法。“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从双方有共同意愿、有合作条件的议题入手,既有利于协商的持续推进,有利于增强两岸民众的信心,也有利于为将来解决政治难题不断积累共识,创造条件”。^[8]一句话,以社会生成的视角探讨两岸互信问题,就是要探寻对两岸持久的信任文化的出现有利的社会条件,亦即运用社会生成原理去理清两岸信任文化的社会决定因素。

二、两岸互信的社会生成机制

机制亦称机理,原意是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在《牛津英语词典》中,机制被解释为“方式、方法或规则、管理,或指具有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体系或结构”。在社会科学中概括地说,就是“带规律性的模式”。^[9]机制可以是原则、规则、协议、机构、过程或决策程序,它强调各要素之间彼此依存、有机结合和自动调节所形成的内在关联和运行方式,它包含制度的内容,也包括各种监督的手段和方法,即工具性的功能。^[10]作为一个具有自我增强效应的连续过程,两岸互信的生成需要行之有效的作为以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这使两岸互信的生成机制有其内在的规律,与社会规范、社会情绪以及社会网络等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一致的社会规范是生成两岸互信的基本条件。在上述信任文化得以生成的五种社会条件中,一致的社会规范最为基本,因为它“使得社会生活更加没有疑问、更加安全、有秩序、可预测”,否则,“不安全和不确定的感觉要求拒绝给予预言性的信任。……这会使得没有人相信信任可以唤起相互的信任”。^[11]就当前两岸现状而言,由于双方缺乏共同认可的社会规范,使得两岸民众生活在一起缺乏可靠的框架和保证,致使在两岸的交流交往中彼此之间仍然是疑虑重重,更不要说推心置腹了,其结果必然是两岸互信不足。鉴于此,两岸应当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和自我克制的态度,共同探索构建可为双方接受的社会规范,如共同认知的社会正义与道德伦理,并着手制定和建立相对一致的行为准则与规则,让两岸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变得可预测和可信赖,为两岸交流合作创造公平的政策环境与友善的社会氛围,如此一来两岸民众就能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不断破除彼此过去的刻板印象,接纳和信任对方,以利于建立起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记忆,从而形成稳定、不可逆转的两岸互信机制。

其次,积极的社会情绪是生成两岸互信的关键因素。什托姆普卡提及的社会环境因素只是提供了人们做出信任的可能性,问题的关键是信任最终是由人来决定和选择的,并且这种决定和选择取决

于人们所具有的个人特性。两种对于信任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的个性特征,“一是与可信性相联系的某种确定的人格症候群。这主要是指与信任相关的信任冲动以及间接地与信任相连的人格特质,诸如积极主义、乐观主义、未来主义等取向;二是社会情绪。对于某一特定的社会(或社区、群体)来说,促成信任文化生成的人格综合特征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分布广泛并共有的。它们一旦传播,就会成为一种宏观的社会秩序的现象,其称之为‘社会情绪’。这种不同的社会情绪促进或阻碍着信任文化的生成。”^[12]从过去几年的情形来看,虽然两岸之间彼此猜忌、相互质疑,甚至恶言相向的情形时有发生,对两岸互信构成重大伤害,但正是由于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坚持正确的态度、保持乐观的心态并由此形成积极的社会情绪,双方在两岸的交流交往中能够不断打开胸襟化解误会、共同努力消除种种不利于两岸关系良性运行的负向情绪,两岸同胞基本上形成了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这为两岸互信的社会生成机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最后,健全的社会网络是生成两岸互信的根本保证。什托姆普卡认为对于信任文化的形成来说,健全的社会网络或关系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因为其“为普遍信任倾向提供了良好的、茂盛生长的场地:一所好的‘信任学校(school of trust)’。……增加了信任文化出现的机会”。^[13]就两岸关系而言,其未来的最终走向不仅仅与两岸之间某些历史遗留问题和结构性难题密切相关,“还取决于两岸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的协调状况。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过程,是两岸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新调整的过程。这意味着两岸今后将面临各种利益和资源的重新协调平衡、各种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的重新建立以及多个层次的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最终在两岸民众之间建立起深度信任的合作关系”。^[14]由此可见社会网络对于两岸关系尤其是两岸互信的重要作用。健全的社会网络有助于两岸之间通畅和有效的沟通,而沟通是强化互信的途径,两岸进行良性沟通就能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减少双方因误解或误会所导致的分歧和矛盾,进而大幅减少因林林总总的事件和风波所致两岸冲突的可能性,最终达到增进相互信任的目的。

总之,从两岸互信的社会生成机制来看,一致的社会规范、积极的社会情绪以及健全的社会网络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缺一不可的,三者之间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才能有助于两岸双方进入一种彼此可信赖、可预期的互动境界。“对预期抱有信心,正是我们定义的信心;而以过去的经验去预见未来,正是信任的一种根据和形式。”^[15]在后 ECFA 时代逐渐浮现出立体的两岸关系中,以往被扭曲的两岸关系将逐步正常化,为两岸互信创设“生活化”场景。台湾学者杨开煌教授认为,经济领域的更紧密深入合作,会推动两岸社会各阶层、多面向、全方位的交流与沟通,引领从“经济合作化”走向“社会融合化”。“‘后 ECFA 时代’,两岸关系将越来越‘生活化’,这使得台湾同胞可以从中更直观感受到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对于台湾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 and 关键性;另一方面,两岸同胞又可以在这种‘生活化’的沟通交流中消除隔阂与误解,社会互信随之趋向顺畅。”^[16]“生活化”带来的两岸互信对于两岸关系可持续和平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两岸互信越强,可持续和平发展的民心民意基础越厚实,发展动力越强劲,发展空间越宽广。

三、两岸互信的社会生成路径

基于上述两岸互信的社会生成意涵和机制,两岸互信的社会生成路径应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首先,两岸从“心”做起,进行积极、主动的信任教育。当前两岸关系已由建设性的“和解、合作、和

平”关系取代以往的“冲突、威胁、对立”的不正常关系。但两岸民众因历史隔阂、政治矛盾、价值观差异所积累的对立情绪与不信任感并未消除,尤其是台湾方面长期以来“去中国化”的教育及对大陆的种种歪曲,造成了台湾民众对大陆的陌生感和不信任感仍然普遍存在。“现实交流过程中未蒙其利、反受其害的群体与个人亦滋生新的不信任与不安全感;加上两岸仍持续在传媒与教育体系中‘妖魔化’彼此的制度、价值与史观;政治菁英亦须投民意所好,以巩固执政基本盘而无意匡正。……导致‘交流又让利、台民越焦虑、陆民失耐性’的结果!”^[17]概言之,因为两岸之间缺乏相互承认的共同史观和政治立场,导致双方缺乏足够的互信,经济利益难以转化为两岸生活方式、价值观与制度的趋同。

为扭转这一情形,与“两岸族”台胞之社会适应^[18]这一消极、被动的信任教育不同,两岸双方应当从“心”做起,积极、主动地通过学校、家庭、媒体以及日常生活等途径对各自民众进行信任教育,如双方共同编撰历史教科书,通过互相抱持虚怀若谷的态度来学习对方,以使两岸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与理解两岸的历史与现状。双方以同理心,“形塑更有气度的论述,将两岸分岔的去殖民化历程重新连结,从感受彼此在去殖民化过程中的伤痛,寻找共有相通的记忆。最重要的是,以同为伤者的视角,换位思考与决策,拉近彼此在认知与价值上的差距,确实在两岸之间与国际社会的内外环境中,同时将‘中国’还原为两岸共有的中国”。^[19]人者心之器,抓住人心才是关键。通过两岸各自卓有成效的信任教育,双方民众有了“两岸共有的中国”这一基本的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即可有效地消除两岸彼此之间的猜疑、歧视及敌视,两岸关系亦将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不断深入和发展。

其次,两岸进行社会制度的相互调适,以增强制度保障和民众的信心。当前两岸仍存在多重层面的不信任感,“原因在于多数台湾民众仍在其现实生活的认知范围,视对岸为自身与所处社会的安全威胁来源。此处的安全威胁,除了历史、军事、政治、外交上的缘由外,亦包含现实交流密切而滋生的诸如经济依赖、犯罪、污染、食品与产品安全等顾虑”。^[20]深究起来,种种顾虑和威胁感其实还是源自两岸之间社会制度的差异甚至是冲突,而制度差异和冲突的背后则是观念、思维和价值观的歧异。台湾学者周志杰曾连续发问“两岸相濡以沫的亲近感在哪里?可黏着彼此的共同记忆在哪里?可实质对接的价值、思维与制度在哪里?关乎未来的‘想像共同体’如何趋同?”^[21]如此等等的疑问值得我们深思。

针对这种那样的疑虑,两岸必须认真、仔细地进行社会制度的相互调适工程,确保两岸社会政策的相对一致以及政府的开放性和透明度等,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祛除不安全感以增强制度保障和民众的信心。“通过‘习得的压力’,新制定的制度能够改造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以达到更大的信任和可信性,使他们更倾向于给予和实现信任。一旦结构的环境被重建而且有利于信任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被建立起来,它将作为通向信任的持续重建的第一推动力而起作用。良性的自我实现机制将启动,因为信任一旦被植入就会培养更多的信任。”^[22]在有制度保障的相互信任基础上,两岸双方就能够更加深入地进行价值观的对话与对接,这是两岸关系从“和平发展”迈向“和谐发展”的关键。由此可见两岸社会制度相互调适甚至重建的重要性,它能够排除诸多负面、干扰因素,使两岸互信持续增强,引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螺旋上升。

最后,两岸开展合作治理,在共同参与中建构认同型的信任关系。面对日益复杂且快速变化的多元社会,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必须进行变革,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挑战,克服各种“不可治理性”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合作治理(Co-governance)模式应运而生。简单而言,所谓合作治理是指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是治理主体平等前提下的共治。“多元共存的社会在运

行机制和社会构成方式上必然是合作制的,只有在合作的原则下,人们之间的交往行为才不是矛盾的和冲突的。”^[23]也就是说,合作治理亦即公权力与民间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或者说公权力与民间社会在公共服务提供上的联合行动。具体到两岸关系中,在两岸面对传统安全争议一时难以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双方可就广泛的非传统安全议题开展合作治理,优先处理攸关两岸民众日常生活的民生议题如教育、医疗、物价、食品安全等问题,贯彻落实两岸之间已签订的多项经济性与社会性协议,以祛除民众不安全感,积累信任感。

所谓认同型的信任关系是一种以认同为基础的信任关系,它假定了当事人的一方已经完全内化另一方的偏好,这是信任的最高秩序。“社会心理学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同一群体的人们比那些非本群体成员更趋于以更值得信任的方式行动。”^[24]在两岸开展合作治理的共同参与过程中,双方应努力建构起认同型的信任关系。“要把合作治理模式的建设与信任关系的建立联系在一起,把它们作为一个共进的过程。事实上,信任会使人乐于合作,而在合作交往中所达成的互惠又反过来增强着信任,这就会使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和合作关系变得越来越稳定。”^[25]一旦两岸建立了认同型的信任关系,双方就更能以同理心和包容心去体谅对方,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础上两岸通过彼此坦诚合作的方法去创造共同的记忆,逐渐塑造出可为双方接受的共同价值观,以弥补长期以来隔绝造成的互信不足。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两岸之间要巩固与深化互信就必须要实现社会规范机制、社会情绪机制与社会网络机制的有机结合,与此同时也要遵循信任教育、制度调适以及合作治理三个主要的生成路径。信任教育是心灵上的沟通,制度调适提供了保障和信心,合作治理则促进认同型信任的建立,三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两岸之间一种可长可久的信任结构(structure of trust)的建构。这是一个相互契合、相互体谅、相互扶持的过程,它不仅能够有效地防止将来两岸之间意外变故的发生,而且可为两岸关系的持续和平发展赢得更加深厚的民心 and 民意,以利于未来两岸关系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为最终解决两岸政治分歧问题创造条件。

四、结 语

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为时代潮流,越来越多的两岸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交往中,成就并分享和平发展的成果。随着两岸共同利益增多,两岸民众的生活方式呈现同步化趋势,两岸社会一体化进程加快。但由于两岸互信水平不高,导致两岸民众在心理上、情感上、价值观上彼此接受和认同的程度还比较低。因此,两岸关系的可持续和平发展既需要丰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更需要双方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寻求核心价值观上的共识或一致,“两岸共同价值必然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吸纳现代文明中人文内涵,突出文明、理性、包容、相互尊重、互相欣赏、互释善意等内涵,是一种现代的、民主的、人文的、人性的、和谐的新文化,符合关怀弱势、讲究公平正义等文明潮流与普世价值,具有现代人文关怀与现代普世价值,以人为本、以两岸同胞的需要为第一位,是融合东西、吸纳古今的新文化”。^[26]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备包容性与开创性的智慧思维,能以同情理解的善意心态,充满自信地、与时俱进地探寻解决两岸关系中结构性矛盾的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探讨两岸互信的社会生成意涵、机制与路径,提出两岸互信的社会生成既需要相应社会条件的造就,也需要两岸双方的积极作为,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 [1] [波]彼得·什托姆普卡《社会变迁的社会学》林聚任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 [2] [3] [4] [5] [7] [11] [12] [13] [22] [波]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5年,第132页,第176-178页,第160页,第162页,第164-167页,第164页,第168-169页,第174页,第179页。
- [6] 《两岸文化交流要善意感动》,中评社高雄 2013年7月11日电。
- [8] 《王毅在纪念海协成立二十周年上的致辞》,国务院台办网站,2011年12月16日,参见 http://www.gwyth.gov.cn/wyly/201112/t20111219_2218245.htm
- [9] 郑杭生、李强等《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48页。
- [10] 李鹏《海峡两岸关系析论》,厦门:鹭江出版社 2009年,第223页。
- [14] 古小明《社会资本:探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视角》,《理论导刊》2011年第6期,第45页。
- [15] 郑也夫《信任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年,第53页。
- [16] 《互信:两岸关系关键词》,《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8月11日,第3版。
- [17] [19] [20] [21] 周志杰《再寻两岸关系深化的动力》,香港《中国评论》2011年第6期。
- [18] 王茹《“两岸族”台胞的社会身份认同与两岸命运共同体》,《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1期。
- [23] [25] 张康之《走向合作治理的历史进程》,《湖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34-35页,第35页。
- [24] [美]罗德里克·M.克雷默、汤姆·R.泰勒编《组织中的信任》,管兵、刘穗琴等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3年,第192页。
- [26] 倪永杰《两岸和平发展路径探索:培植共同利益、形塑共同价值》,香港《中国评论》2009年第7期。

(责任编辑:张文生)

A Study on Social Formation of the Cross-Strait Mutual Trust

Shen Huiping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ross-strait mutual trust is the co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ts relations. As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 is substantially based on its social foundation, the key to the problem lies in its exploration of the basis. The principle of social formation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gives us a unique view for the trust problem,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trust issue, such as the social implication, mechanism, and path. First of all, the social formation of the trust is, in fact,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self-reinforced effect, which needs some relevant social conditions. Secondly,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 of the trust has its inherent laws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actors such as social norms, social emotion and social network. Finally, the generative path to the trust includes positive trust education, mutual adjustment of social system and co-governance across the Straits. In a word, the creation of the social formation of the trust involves both corresponding social conditions and the efforts made by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Key Words: cross-strait mutual trust, social formation, social conditions